# 一面映照历史和文化的镜子

## ——在北大后EMBA第九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

□ 叶小文

新论语

第九期“北大后EMBA”今天开学。

这里何其了得——未名湖畔博雅塔下，近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家园；蜚声国内外，由严复创立，曾有李大钊、马寅初执教，曾培养出李克强等一批杰出人物的北大经济学院；

课程何其了得——MBA、EMBA基础之上的“后EMBA”；

学生何其了得——大都是社会精英，人人持瑾山之玉，个个握灵蛇之珠；

教师何其了得——云集权威大家名师，汇聚精英政企资源，汲取中西人文精华，凝聚中国精英力量；

目标何其了得——要“超越管理，超越财富，超越自我”。

超越，超越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，起来，起来！”到了今天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，只有几步之遥，每个人都自觉发出强烈的呼喊，超越，超越！

超越，是国人的梦想，是我们的担当，更是大家顽强的努力和扎实的奋斗。超越，需要有自知之明，常知耻后勇，善学习借鉴，能扬长补短。

要全面超越，要后来居上，必须正视我们还有很多不足，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奋起直追。比如，足球，就是国人的一面镜子。

电视天天播放巴西世界杯的“豪门盛宴”。尽管我们于盛宴无缘，吃着“闭门羹”，却照样熬夜为别人喝彩。

这是人类关注度最高的一项体育赛事，当然也就是一场盛大的文化聚会。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、作为经济35年持续增长而举世瞩目的国家、作为成功举办奥运会且金牌总数获第一的国家，作为今年刚成功主办亚信峰会、还将主办APEC峰会的世界不可或缺的国家，却总是缺席着世界杯。

13亿人出不了一支足球队，怪谁怨谁？

怨亚洲人吃肉少了身体素质不行？中国的足球要从爷爷抓起，从爷爷辈就多吃肉改善体质。但近邻的日本、韩国、伊朗人，吃的肉未必比我们多，都到了巴西。虽未进一球，无缘十二强，但毕竟还是打进了世界杯。

怨自己技不如人？中国历来不缺技艺高超的人。且看我杂技、气功、武术，“江山秀丽，叠彩峰岭，问我国家哪像染病？”

怨足球是中国人不熟悉的运动？可国际足联确认足球起源于中国，叫“蹴鞠”；《水浒》里有个角色，叫“高俅”。

怨教练不行？我们也花钱请过高人了。

怨机制不对？我们也引进职业联赛了。

怨球风不正？我们为制止赌球，已依法抓人、判刑，纠风了。

……

可是，13亿人就是出不了一支足球队。

基辛格退休后当过足球评论员。他说中国足球队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，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害了他们，他们只知道集体主义，缺乏个性，缺乏想象力。此论谬也。中国文化当然强调集体主义，但也张扬个性。讲君子要“修齐治平”，就把个人与天下联系起来了。何况中国出了那么多放射着个性光芒的文学家、艺术大师。

但是，13亿人就是出不了一支足球队。

倒是基辛格提醒我们，这其实是文化现象，不妨作文化反思。

起码可以反思三条：

其一，足球需要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与整体协调的高度配合。其实不光足球，我们在很多方面缺的就是这个协调配合。强调个人就忘了集体，强调集体又牺牲了个人。我们天天讲马克思主义，却忘了马克思主张的理想社会要“实现人的自由、解放和全面发展”，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”。

其二，足球需要进取与防御的巧妙结合。不光足球，我们在很多方面缺的就是这个巧妙结合。我们善于打阵线分明的排球、乒乓球，不善于踢混战一场纠缠不清配合默契对抗激烈的足球。尤其搞不懂“越位”，不知道怎么样“帮忙不添乱，尽职不越位”。我们的祖先就强调界限分明，所以修长城、搞“海禁”。但现在经济全球化，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，就难以分明了。我们必须学会在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防范西化，抵御渗透，踢好“足球”。

其三，不要空喊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”，看到一个小国的球队，进球的球员激动地撩起球衣上的队徽亲吻，我们作何感想？不要空喊“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”，看我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，怎么就改革创新不出一支足球队？

“十年瞰鞠将雏远，万里秋千风俗同”。足球是一面镜子，一面让国人尴尬、脸红的镜子。

知耻而后勇，让我们，不仅是足球队，都来照一照这面镜子。

习总书记说，中国是个善于学习的大国，我们方方面面都在学习，都在超越。希望有志于“超越管理，超越财富，超越自我”的北大后EMBA们，真的实现超越，不断超越，从未名湖畔博雅塔下，走出一支支问鼎“世界杯”的“中国足球队”！

**（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、第一副院长）**

## 当代中国人该有怎样的历史担当

◆中华民族这一百多年来历经磨难，现在离民族复兴越来越近。近代百年为了从积贫积弱走向民族复兴,经历过多少苦难、挣扎和悲伤,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。好不容易走到现在,切不可再耽误。必须往前走,必须勇于试,这是我们的责任所系。不干可能不犯错误,但要承担历史责任。

◆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,各项事业也在不断发展。再往下走,每一步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巨大飞跃。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增长后,往往出现拐点,由盛而衰。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,持续发展?再往下走,每一步都是惊险的一跳。

◆历史上，一步走错满盘皆输、功亏一篑、积重难返的教训不少。百年之前美国和阿根廷的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，现在的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。世界银行警告：“在过去50年中，许多国家从一贫如洗的收入水平升到了中等收入水平。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，在欧洲以外，只有少数国家从低收入水平跃升到了高收入国家。世界上最失落的地区当属拉丁美洲，它的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，停止了增长。”国际经验表明，人均GDP在3000美元—10000美元的阶段，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，又是矛盾增多、爬坡过坎的敏感期。这一阶段，经济容易失调，社会容易失序，心理容易失衡。一句话，步子容易迈错，机遇容易丢失！

◆前车之鉴不可覆，拉美陷阱不可入，走不好可惜，走好了不易。走好了就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梦想让人激动，步子更当稳健。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、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。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，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、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。实现中国梦必须把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，汇集成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，紧紧依靠人民，不断为人民造福。

◆蓝图、梦想，决心、信心，共识、干劲，都要有。但更要有足够的本领。面临新形势、新问题、新任务，我们的本领不够了。

◆改革者催动着改革骏马飞奔,必须“蹄疾而步稳”。这对改革骑手来说,需要多么高超的本领！然而,我们的本领,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,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,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。正如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延安的讲话: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,不是经济恐慌,也不是政治恐慌,而是本领恐慌!我们必须把高度的责任感、清醒的危机感化为加强学习的紧迫感,把外部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内部的高度自觉,多一点学习、多一点思考、多一点实践,少一点无谓的应酬、少一点虚妄的空谈,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。

**（摘自叶小文相关论述）**

# 最高级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

□ 万维钢

**最高级的想象力是步步为营、精心计算出来的结果。**

曾有文章提到，爱因斯坦说过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”，此话是否属实已无从考证了，然而，有人把此话推论到“想象力和知识是天敌”，意指人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，想象力会消失。因为知识符合逻辑，而想象力无章可循。换句话说，知识的本质是科学，想象力的特征是荒诞。

笔者不知道没有知识的人能想象出什么东西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·高普尼克(Alison Gopnik)有一本著述——《宝宝也是哲学家——幼儿学习与思考的惊奇发现》(The Philosophical Baby)，介绍了现代认知科学对人类想象力的研究成果。高普尼克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，想象力来源于知识，正是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知识以后，儿童的想象力才成为可能。

人能想象自己在天上飞，是因为看到鸟在天上飞。我们可以比较30年前的科幻电影和现在的科幻电影，同样是描写数百年之后的未来世界，哪个描写得更像？显然是现在。有一个古老的科幻电影里，主人公要打视频电话，结果居然需要用一只手拿着个听筒。在那些老的科幻电影中，未来世界的飞船控制室里面布满了各种键盘和指示灯，而现在的电影里全是超大超薄外加透明的触摸屏。如果我们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发明一个触摸屏，这帮专门负责想象的电影制作人可能就忘不了键盘。

有人曾经有这样一个观点，中国古代的神侠小说也不少，但是“暗器”却几乎没有出现；而现在的武打书里面本本都有暗器。为什么古人想象不到暗器？因为暗器是近代小说家受到手枪的启发想象出来的。没有知识，让你随便想你都想不到。

对于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这种想象力，笔者认为存在两个等级。

初级的想象力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玩“what if”(如果)游戏。What if老鼠会说话？What if老鼠能驾驶玩具飞机？What if老鼠能开玩具火车？

一个整天问“what if”的人，可以写出一大堆童话故事来。这些故事讲的其实不是老鼠，而是披着老鼠外衣的人。孩子们以为听到了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，其实是讲述小朋友自己的故事。而“小朋友自己的故事”，成不了世界名著。我们注意，这种“what if”想象力是完全“自由”的，你没有义务解释肚子里为什么能长出樱桃树。没人会追问这个问题。

想要写一个像《指环王》、或者《哈利波特》、《阿凡达》，这样有很多人关心的故事来，所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等级的想象力。一种不自由的想象力。

写幻想的世界名著，你必须构建一个完全自洽的想象世界。“自洽”，self-consistent，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。你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山可以在潘多拉星球悬浮——因为山上的矿石中含有常温超导物质，而且该星球磁场紊乱——而人类之所以要来这个星球就是为了这种物质——潘多拉星球磁场紊乱，这也是该星球上的动物有一定的感应能力的原因——而磁场之所以紊乱，是因为附近有几颗别的行星，你都可以在天空中看到……几件事必须能够互相解释，是一个完备的逻辑系统。

除此之外，你要估算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，你“想象”出来的这些动植物必须符合这个星球的环境，你得请语言学家专门给土著发明一种语言……你需要编制了一本《潘多拉星球百科全书》。

《指环王》和《哈利波特》也是如此。除了世界观自成体系之外，这两本书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作者对欧洲神话要有相当深的研究。各种魔法、种族和道具不能胡乱想象，必须符合一定的传统。我国的《西游记》也是这方面的典范。

这种想象力是天马行空胡想乱想的么？显然不是，这是步步为营精心计算出来的结果。《阿凡达》中的各种神奇植物是受到海洋生物启发的结果，山的造型可能来自中国，就连故事情节也是人类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的殖民事件的翻版。为什么想象力必须跟实际有联系？因为对于说不通的东西，人们可能不感兴趣。

所以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。正是因为不自由，它的难度才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导演拍不出来《阿凡达》，他们缺的不是“自由”，而是这种“不自由”的超难脑力和物力。

“自由想象力崇拜”的背后，是“顿悟崇拜”。这种思想认为一般人终日被自己的知识所束缚，而一旦跳出这种束缚，就能够取得重大的突破。这种思想其实是对科学发现的庸俗解释。

一旦有一个一般人没想到的发明出现，就会有人解释说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个发明，是因为他是“自由想象”的。好像科学中存在无数个可怕的“禁区”，别的科研人员从来都不敢往这个方向上想一样。其实你能想到的东西，专业人员早就想过了。

笔者多年前看《费曼物理讲义》，其中有一小节，叫做《相对论与哲学家》。费曼说，相对论流行以后，很多哲学家跳出来说“坐标系是相对的，这难道不是最自然的哲学要求吗？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！”可是如果你告诉他们光速在所有坐标系下不变，他们就会目瞪口呆。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其实比“想象家”更有想象力。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可能每天都有无数个怪异的想法，真正的困难不是产生“怪异”的想法，而是产生“对”的想法。

最后，让笔者用波尔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。所有认为自己特别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仔细读读这段话。

We are allagreed that your theory is crazy. The question that divides us is whether it iscrazy enough to have a chance of being correct. ——Niels Bohr

你的理论的疯狂是个不争的事实，但令我们意见不一的关键是，它是否疯狂到有正确的可能。——尼尔斯·波尔

**（作者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）**

学林漫笔

历史上的经济变革

# 整体配套改革的“终结之作”

□ 吴晓波

**王安石变法是全方位的配套改革，然而结局却很惨烈，这令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。**

在经济史，乃至整部国史上，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。变法之前的中国，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，是一个开放的国家。变法以后的中国，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，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，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我们需将这场变法与宋政权的很多制度联系起来思考。首先是“杯酒释兵权”，宋太祖赵匡胤将兵权统统收缴到中央，由“兵在藩镇”改为中央养兵。此后，地方藩镇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。然而，另外一个大问题却旁生出来，即军费支出不堪重负，是为“兵政之患”。

此外，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，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：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，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，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。

其中，全汉升在《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》这篇论文中，总结出了宋代官员经商的六个“特异的地方”，包括：以公款作资本，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，以官船贩运，利用公家的劳动力，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、逃税。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“特异的地方”。

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，那么，政府对民间商人的“授权经营”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。这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，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，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、定价权和分配权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，成为一种权贵经济模式。

宋代开国一百年以后，毛病就出现了。第一个是贫富差距拉得很大，穷人很穷，富人很富；第二个是土地兼并，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上。而财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长，捉襟见肘，于是就要改革。

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，登基时20岁，很年轻。宋神宗找的操盘人就是王安石。

王安石颁布的法令，大大小小有十余条，分别是均输法、市易法、青苗法、农田水利法、免役法、方田均税法等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条。

均输这两个字来自于桑弘羊，就是国家成立物资部和物价委员会，管制重要生产资料的产销。这个法令推行后，国家就全面垄断了重要资源的生产和销售；市易法是对城市商品零售的国家垄断，政府在各地设立市易司，由政府拨出本钱，负责平价购买“滞销商品”，到市场缺货时出售，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；青苗法则是农业领域的变革，在每年夏秋两收前，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，以补助耕作。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%，一年可贷两次。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，“王安石变法”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：第一，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；第二，打击富豪，缩小贫富差距。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：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，长远看却注定失败；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。

具体来说，变法实施之后，国库果然为之一饱，仅市易司获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年夏秋两税总收入的三成，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惊人，因为征缴上来的钱粮绸帛实在太多了，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个大仓库。

可是很快，弊端就呈现出来。

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“政府型公司”，它到处与民争利，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道而驰，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，要么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收受回扣，发运使把大米运到一些缺粮地区，销售价格比之前上涨一倍，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。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，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。

市易法“尽收天下之货”，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、银行和物流中心，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，连水果、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，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。

对普通农户来说，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，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，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。可是一到执行阶段，就完全地变味了。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，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，放的时候斤两不足，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，一来一回，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。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，就下达贷款指标，地方官只好搞摊派，民间苦不堪言，如果发生水灾旱灾，地方政府为了收回本息，就到处抓人，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。

种种新政的实施，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，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民国学者王孝通在《中国商业史》中一言以蔽之——自王安石变法之后，“商业早入于衰颓之境矣”。

王安石创造了一个贪婪的集权制度，他的继任者蔡京是国史上出了名的贪官和奸臣，他把王安石的国家主义推到了极致，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性的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础的，好的制度会遏制人的恶，反之则会催化和放大之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比人的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贪婪。

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，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(靖康元年)，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，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。1127年，北方的金军攻破汴梁，掳走宋徽宗、宋钦宗，北宋就这样亡了。

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，“王安石变法”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。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，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，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，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，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。自北宋之后，南宋、明、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，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，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、趋向保守，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。

□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